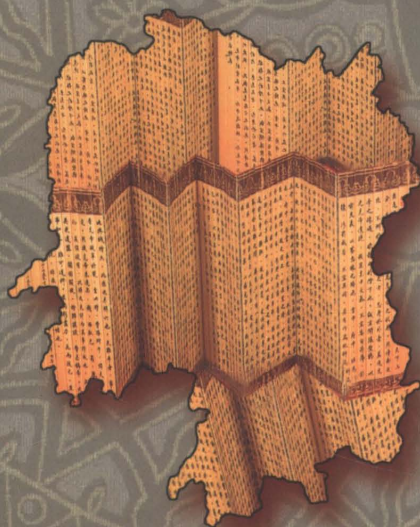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 编委会主任：蒋作斌
● 主 审：张作功
● 主 编：张学军



岳麓书社

湖南教育大事记

HUNAN JIAOYU DASHIJI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编

湖南教育大事记

HUNANJIAOYUDASHIJI

编委会主任：蒋作斌

主 审：张作功

主 编：张学军

(远古——2000 年)

岳 麓 书 社

湖南教育大事记编委会

顾 问：冯象钦 刘欣森 孟湘砥

主 任：蒋作斌

副主任：张作功 张学军

编 委：彭世华 卢国良 唐国庆

黄宜锋 陈达道 胡国强

黄超文 欧阳河 赵雄辉

罗 福 李倡平 黄龙威

主 审：张作功

主 编：张学军

副主编：刘先捍 胡国强

编 辑：古 夫 黄其超 桂建生

谭小京 李云中 蒋书同

伍春辉 田景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南教育大事记/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编. —长沙:岳麓书社, 2002

ISBN 7-80665-182-9

I. 湖… II. 湖… III. 教育事业—大事记—湖南省 IV. G52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6405 号

责任编辑 张铁燕

皮朝霞

封面设计 古 夫

湖南教育大事记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编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市精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16 印张: 50

字数: 1,300,000 印数: 1—1,500 册

ISBN 7-80665-182-9

G.261 定价: 1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长沙市中山路 50 号 邮编: 410003

让历史告诉未来

(序一)

湖南省教育厅厅长 蒋作斌

沐浴着新世纪的曙光,湖南教育园地的一朵奇葩——由省教育厅史志办公室负责组织策划,省教育界有关老领导、老同志担纲,数易寒暑精心编纂的《湖南教育大事记》终于出版了。

《湖南教育大事记》时间跨度数千年,从远古有教育现象开始,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隋唐、宋元明清……至20世纪最后一年,勾勒了一幅多姿多彩、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是湖南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基本理论建设,具有权威性、史料性和信息总汇性;对于研究湖南教育发展历史,进而深入研究湖南教育发展的特点和发展方略,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都将起到一定的作用。它有两个较为明显的价值:第一是史料性,第二是适用性。从“史”的方面来考察,无论是总结过去,探析现今,还是筹划未来,或留以备考,它都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史证作用。从“用”的角度来评价,它全面、完整、准确,不虚美,不掩过,详述了湖南教育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对教育界,还是社会各界,都是一份极为珍贵的资料手册。可以说,这部著作是传诸后世的宝贵财产,也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和国情、省情教育的学习教材,是与国内外进行教育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我为有这样一部好书而兴奋,更为我们湖南教育事业的繁荣而欣慰。编纂这样一部《湖南教育大事记》,真是一项浩大的工作。我真诚地感谢老领导、离退休老同志、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同志们为我们办了这样一件功利千秋的好事。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从澧县城头山出土的老城、稻田和谷物,说明湖南先民早在8000多年以前就初步掌握了种植、陨铁锻制和烧陶浇铸的技术。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属楚,公元前519年,周室王朝将东周文化南移至湖南,与当地的巫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以长沙为中心、独具特色的楚文化教育。《管子·大匡》论述春秋各国教育的特点时说:“楚国之教,巧文以利。”屈原所作《楚辞》就文采绚丽,讲究功利,既体现了楚国教育的特点,又反映了当时楚国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易经》、《书经》、《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经脉》、《五十二病方》、《天文气象杂占》等古籍,充分反映了当时湖南文化教育的鼎盛。

湖南学校的发展,《后汉书》中就有记载。西汉以后,政策宽松,地方官吏奖励农桑,湖南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进步,教育广泛发展,湖南的学校教育已向湘南、湘西偏远地区发展。三国时,湖南四郡由汉归吴,洞庭湖区和湘、资、沅、澧四水流域又有进一步发展。到西晋末,已是“荆扬晏安,户口殷实”了。隋、唐两代,湖南较诸北方尚称安定。北方人的南迁,给湖南带来大批劳力和先进技术,也带来了先进的教育经验,出现过“湘州之奥,人丰土闲”的景象。这个时候湖南的官学制度日趋完善,科举取士开始繁荣。宁远李邕于文宗大和二年(828年)考中全国第一名进士(状元)。

宋代,湖南教育发展较快,道州周敦颐为理学开山鼻祖。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创立了长沙岳麓书院,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又创立了衡阳石鼓书院,开书院之先河。全国8大书院,湖南就占了两个。宋室南渡以后,湖南又建书院64所。理学家胡安国、胡宏父子在衡山碧泉书院和文定书堂讲学授徒,开创了湖湘学派。张栻将湖湘学派的基点移至长沙,更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基础,并把湖湘文化推向全国。《宋元学案》一书中说:宋代学术,湖湘学最盛。特点是重视“求仁履实”,讲求“经世致用”。当时,私人办学和自学之风更为昌盛。

到了明朝,湖南官学具有一定的规模,少数民族集居最多的湘西也办起了若云书院,还派子弟赴外学习,鼓励发奋求知。

清朝时期,尤其是1840年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湖南教育不断发展,建有各种书院387所,数量仅次于四川、江苏,居全国第三。私塾的发展更为普遍。教育的发展使人才辈出,流传着“中兴将帅,十九湖湘”和“无湘不成军”的佳话。魏源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左宗棠开创洋务运动,郭嵩焘出任清朝首届驻欧使节等,对全国影响深远。戊戌维新时期,湖南立学会,开学堂,办报纸,兴实业,有“学堂甚盛”之称,故时人夸为“全国最富朝气之一省”。

清末湖南学子踊跃留学日本、欧美,人数居全国前列。湖南在日本参加同盟会的就有157人,居全国各省第一,产生了饮誉遐迩的一代英豪,如黄兴、宋教仁、蔡锷、唐才常、禹之谟、姚宏业等,他们都是湖南的受教育者,也都是湖南传播教育的领路人,更是中国推翻帝制的先驱。民国年间,湖南有一群志行高远,为发展教育事业毁家输产,奔走呼号的办学中坚,如徐特立、方维夏、朱剑凡、胡元倬、陈润霖、王季范、曹典球、何炳麟、朱经农、胡庶华、张孝骞、廖世承、孔昭绶等。唐才常转述西方各国和日本的言论称“振支那者惟湖南,土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杨度早年写过一首《湖南少年歌》,很自豪地吟咏道:“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以后,由于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动政府的腐败,竟使我们湖南的近代教育遭遇了毁灭性的破坏。

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湖南教育和全国一样,才掀开了崭新的篇章。作为名耀于近现代史,声播于国内外的教育之乡,湖南教育以其源远流长的传统和人才济济的实力,创造了灿烂骄人的成绩,也经历了山重水复的波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教育理论指引下,湖南教育围绕“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全方位改革,焕发了蓬勃生机,走出了一条符合湖南实际,具有湖南特色的教育发展之路,为湖南省迈向21世纪做好智力和人才准备,为实现“科教兴湘”的宏伟战略目标做出了贡献。

当前,湖南教育已迈入新的世纪,正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进程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教育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文明进步中的关键性、基础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在前年初召开的全省教育科技工作大会上,省委书记杨正午代表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建设教育强省”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就我省现有的经济和教育基础来看,可以说任重道远。“十五”期间,我们必须立足于湖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教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坚持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指导,以“适度超前发展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主题,以调整为主线,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要求、更好地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努力扩大教育规模,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通过几年努力,使教育更加贴近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加贴近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更加

接近发达省市的发展水平,从而为把我省建成教育强省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要实现“十五”教育发展目标,一方面,要正视现实,对在改革中前进的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一个科学的、理性的认识和把握;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悠久的历史文化,从丰厚的文史宝藏中汲取营养,以史为鉴,在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相统一的切入点上,做出理性的抉择和科学的论断,从而做好我们的工作,切实推进我们的事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事物发展的过程,今天由昨天走来,又成为明天的历史,后浪推前浪,形成无限长河。历史是连续的,因而也是割不断的。我们的任务在于,正确运用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从新的条件、新的角度,去求取规律性的新的认识,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去迎接我们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新高潮。

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今后更好地发展。是为序。

存史·资政·育人

(序二)

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 张作功

由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主持,省教育界数十名专家、学者呕心沥血,耗时几载的《湖南教育大事记》终于付梓了。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值得庆贺!

《湖南教育大事记》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集湖南古今教育之大成,全书百多万言,采用传统的编年体形式,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按年、月、日,以条目形式出现,全面反映了我省上起先秦,下至20世纪末叶,历时数千年的教育面貌、教育演变、教育发展、教育改革等方面的大事、要事和新事,涉及到了各个时期的教育政策、教育法规、教育制度和郡(市)、州、县官学、私学、社学、义学、书院等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规模和沿革,可谓三湘四水的教育历史尽收眼底。一书在手,对湖南教育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即可大致了然。它不仅是从教育的角度对湖南历史的反思和文化的整理,更是我省继《湖南教育志》后又一具有开拓性的为教育理论研究作前提准备的指导大著,填补了我省教育战线这方面资料工具书的空白,挖掘了我省历史上一部分很有实用价值的教育遗产,从而为我省教育档案库、数据库、资料库增添了宝贵的财富,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为各类教师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提供了借鉴和咨询,为各类教研人员深入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和编史修志、梳理历史脉络、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并将启示我们从湖南的实际情况出发,吸收人类优秀的文化教育遗产,推进湖南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促进湖南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实证明,成功的教育现代化,不仅要善于克服传统文化弊端带来的束缚和阻力,尤其要善于利用传统文化精华作为革新和前进的动力。在世纪之交的今天,重新审视湖南教育发展的历史,全面认识和总结湖湘文化,以史为鉴,这确实是一项对当前的教育改革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值得提倡。

大事记是史志的基础,也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一部好的教育大事记,应该达到存史、资政、育人的目的,即从中不仅应发现教育的规律,能够“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应能够预见教育未来发展的趋向,为教育预测、教育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以开阔人的视野,启迪人的智慧。为此,在编写《湖南教育大事记》的过程中,编写组的同志始终遵循了下列三个原则:一是客观性原则。即坚持细致、谨慎、认真、公正的态度,做到秉笔直书,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严格把握评价尺度和诠释标准,既肯定优点,也不讳言缺欠,实事求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科学定论,力争在理论层面对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进行剖析论证,不臆断,不简单地训诂,以期还历史以原貌,指导今人和后人去总结教育的优劣得失、好坏对错。二是时代

性原则。即在研究和编写大事记的过程中,不仅深入挖掘和整理湖南教育的历史资料,而且还认真了解和研究当今国际、国内教育史学研究的新进展、新成果,特别是借鉴新的研究方法,运用现代化手段引用典型资料及准确的统计数据,同时,注意提倡严谨、质朴、通俗、平易的文风,以期满足各个读者层次的需要,扩大影响。三是地方性原则。即在宏观把握我国教育发展总体脉络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展现出湖南教育发展历史的特点和地域特色,对古代、近代、当代湖南教育史料的编写,注意有连续性和伸展性,做到“纵不断线,横不缺项,大事突出,要事不漏,新事不丢,琐事不录”,把地域特色溶于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教育史实和人物之中,使之资料翔实,考证准确,分析客观,史貌丰满。实践证明,上述指导原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它保证了《湖南教育大事记》的信度,使其以一部信史取信于当代和后世。

组织和完成《湖南教育大事记》这样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要求高,难度大。湖南教育源远流长,有关教育方面的史料浩如烟海,要在茫茫的史海中,通过搜集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寻求一条通向彼岸的捷径,绝非一件易事。《湖南教育大事记》的编纂动议由来已久,早在1992年《湖南教育志》完稿后,有关领导就提议在“志”的基础上撰写《湖南教育大事记》,但由于经费不足、资料搜集困难等原因,未能立即实行。1997年,国家教委下达了《关于开展〈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通知》,湖南省教育厅即开始着手《湖南教育史》的研究,《湖南教育大事记》的工作又给耽搁下来。直到1999年才把编纂《湖南教育大事记》的工作排上了议事日程。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省教科院从以下两个方面精心组建了编写班子:一是原编纂《湖南教育志》和《湖南教育史》的部分人员,一是省教科院的新配人员。这些编纂人员深感责任之重大,从论证、体例、编目到搜集、整理、编写、审稿、定稿,每一个环节都不敢有丝毫懈怠。在工作中,他们彼此相互支持,精诚协作,无私奉献:有些老同志克服年老多病的困难,善始善终地当参谋,提线索,出主意,还亲自寻找资料,撰写和修改条目;有些中青年同志克服家庭的难处,利用节假日跑图书馆、档案馆等有关单位,长期浸泡在资料书籍中;尤其是一些当时还没有在教科院安排工作的同志,他们不为职务提升,不为奖金福利,只求耕耘,不问报酬,没日没夜勤勤恳恳地工作。为了保证书稿质量,力争编出上乘之作,他们还在查阅大量的官方文件、档案、文书、文集、书信、日记、笔记、地方志、碑文以及报纸、杂志的基础上,多次召开咨询研讨会,广泛征求厅领导和厅机关各处室及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如最初,编写组拟采取以史为经,问题为纬,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将各历史时期的教育分为若干板块,再进行筛选的编纂方法,后来经过咨询论证,他们觉得这样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许多很有价值的内容就会因问题不符而筛选掉,因而就不能很好地反映湖南教育发展的全貌,有违编纂《湖南教育大事记》的初衷。于是,他们决定打破原拟的布局结构,按历史年代顺序确立框架,尽一切办法,宁愿多费一点时间,多跑一点路,多发动一些同志,多开动一些脑筋,多开一些门道,只要是反映当时的教育而又有较大影响的都收进来,古代有多少就尽量挖掘多少,现在有多少就尽量收入多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历史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进行编写,力求做到历史性、完整性、科学性的统一。编写组的这种踏实的作风,务实的精神,使得全书的史料,不仅全面丰富,而且翔实准确,从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湖南教育大事记》作为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筚路蓝缕之作,自然还存在一些美中不足之处。譬如:由于受编纂者水平和资料的限制,加之历史上的大事、要事都是相对的,不可能有统一、绝对的标准,因取舍的角度与尺度不同,编选者见仁见智,导致一些该录的大事、要事未录,而一些可录可不录的琐事又录上去了。又如,由于受编年体形式的束缚,有时把一件大事按时间分割了开来,从而影响了事件完整性的了解,同时,还由于受篇幅的限制,详略取舍不当,

有的条文过于简略,令读者难知其原委,而有的条文又显得过于冗长,并出现部分重复的现象。尽管如此,但总的说来,《湖南教育大事记》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前人和今人教育成果的凝聚,汇集的都是我省各个时期,尤其是解放以后老一辈教育工作者一代一代创造和保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因而是很有影响,很有价值的。历史和人民将永远铭记开拓者的足迹和业绩。

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着的历史。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当然也就不会有将来。历史的经验的可贵,在于供给人们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力量,在于给人们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的方法和智慧。我们只有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实,展望未来。我认为《湖南教育大事记》是一本存史、资政、育人的好教材,尤其我们办过教育的同志,都可以从后面近几十年的历史中找到自己的足迹,产生亲切感。希望全省每个教育工作者和每个教师都认真读一读,以便让历史给我们以新的启示,去实现我省建设“教育强省”的宏大目标。

目 录

？～公元前 221 年(先秦).....	(1)
公元前 221～公元 220 年(秦汉)	(8)
公元 220～280 年(三国).....	(11)
公元 280～420 年(两晋).....	(13)
公元 420～589 年(南北朝).....	(15)
公元 581～907 年(隋唐).....	(17)
公元 907～960 年(五代十国).....	(24)
公元 960～1279 年(宋代)	(26)
公元 1279～1368 年(元代).....	(40)
公元 1368～1644 年(明代).....	(47)
公元 1644～1840 年(清代(鸦片战争前)).....	(62)
公元 1840～1911 年(清代(鸦片战争后)).....	(72)
公元 1912 年(民国元年)	(110)
公元 1913 年(民国二年)	(115)
公元 1914 年(民国三年)	(118)
公元 1915 年(民国四年)	(121)
公元 1916 年(民国五年)	(124)
公元 1917 年(民国六年)	(127)
公元 1918 年(民国七年)	(130)
公元 1919 年(民国八年)	(132)
公元 1920 年(民国九年)	(138)
公元 1921 年(民国十年)	(144)
公元 1922 年(民国十一年)	(148)
公元 1923 年(民国十二年)	(152)
公元 1924 年(民国十三年)	(156)
公元 1925 年(民国十四年)	(162)
公元 1926 年(民国十五年)	(167)
公元 1927 年(民国十六年)	(175)
公元 1928 年(民国十七年)	(179)
公元 1929 年(民国十八年)	(182)

公元 1930 年(民国十九年)	(186)
公元 1931 年(民国二十年)	(190)
公元 1932 年(民国二十一年)	(195)
公元 1933 年(民国二十二年)	(200)
公元 1934 年(民国二十三年)	(204)
公元 1935 年(民国二十四年)	(208)
公元 1936 年(民国二十五年)	(212)
公元 1937 年(民国二十六年)	(216)
公元 1938 年(民国二十七年)	(222)
公元 1939 年(民国二十八年)	(227)
公元 1940 年(民国二十九年)	(230)
公元 1941 年(民国三十年)	(234)
公元 1942 年(民国三十一年)	(238)
公元 1943 年(民国三十二年)	(241)
公元 1944 年(民国三十三年)	(244)
公元 1945 年(民国三十四年)	(246)
公元 1946 年(民国三十五年)	(250)
公元 1947 年(民国三十六年)	(254)
公元 1948 年(民国三十七年)	(257)
公元 1949 年(9 月 30 日止为民国三十八年)	(260)
公元 1949 年(10 月 1 日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264)
公元 1950 年	(269)
公元 1951 年	(276)
公元 1952 年	(284)
公元 1953 年	(290)
公元 1954 年	(297)
公元 1955 年	(302)
公元 1956 年	(309)
公元 1957 年	(319)
公元 1958 年	(326)
公元 1959 年	(334)
公元 1960 年	(339)
公元 1961 年	(350)
公元 1962 年	(355)
公元 1963 年	(362)
公元 1964 年	(370)
公元 1965 年	(376)
公元 1966 年	(381)
公元 1967 年	(388)
公元 1968 年	(391)

公元 1969 年	(396)
公元 1970 年	(399)
公元 1971 年	(402)
公元 1972 年	(404)
公元 1973 年	(407)
公元 1974 年	(410)
公元 1975 年	(413)
公元 1976 年	(416)
公元 1977 年	(419)
公元 1978 年	(425)
公元 1979 年	(436)
公元 1980 年	(448)
公元 1981 年	(458)
公元 1982 年	(471)
公元 1983 年	(485)
公元 1984 年	(497)
公元 1985 年	(510)
公元 1986 年	(519)
公元 1987 年	(528)
公元 1988 年	(539)
公元 1989 年	(549)
公元 1990 年	(565)
公元 1991 年	(581)
公元 1992 年	(592)
公元 1993 年	(609)
公元 1994 年	(625)
公元 1995 年	(646)
公元 1996 年	(666)
公元 1997 年	(685)
公元 1998 年	(702)
公元 1999 年	(721)
公元 2000 年	(746)
后 记	《湖南教育大事记》编写组(773)

？～公元前 221 年(先秦)

湖南东临罗霄山脉,西接云贵高原,南枕五岭山脉,北隔长江天险,是为“四塞之国”,社会进步迟缓。上古湖南为“群蛮”聚居之地,远在中更新世(距今约 100 万至 10 万年)后期就已有人类的活动存在,夏以前称“三苗之国”,殷商、西周称“荆蛮”之域。直到春秋初期,土著居民大多尚处于原始氏族制度和原始经济的解体阶段,被中原王朝视为“化外之民”,多次兴兵征伐,但因地势易守难攻,民性倔强,故周昭王伐蛮荆,连性命也伐进了湘江。湖南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具有丰富的农、林、牧、渔业资源,又是“有色金属之乡”,人民勤劳智慧,8000 多年前开始了稻作农业,6000 多年前就建造了自己的古城,3100 多年前就能按铜、锡、铅、锑的不同比例,铸造青铜乐器、兵器和礼器。

最新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在沅水、澧水、资水、湘水流域地区,湖湘先民率先进入了旧石器时代。在他们与自然作斗争的漫长过程中,使用、加工劳动工具的技术和原始的团结合作、互相帮助、共同对敌等观念得以世代相传,从而诞生了原始的教育。

距今大约 9000 年前,湖湘先民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最显著的标志是磨制石器和陶器的产生,以及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出现,人们开始定居,并由此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城市雏形。在新石器文化早期,湖湘先民主要活动于洞庭湖边缘、澧水下游以及湘、资、沅水流域的河谷地带。他们在生产生活活动中不仅发明和学会了石器磨制、陶器烧制、稻谷栽种、家畜饲养、房屋建造、火的储存和使用等技术,而且还通过生产生活过程将这些技术一代代传递下去。这就是原始的科技教育和生活教育。

1988 年,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发掘出新石器时期遗址,其年代距今 9100～8200 年,比黄河流域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裴李岗文化”还早约 1000 年。其“遗址出土了大颗粒植物种子,并在红烧土块及支座残断面中观察到稻谷的痕迹,这证明当时在地势宽阔平坦的湖沼地带边缘有以稻谷为主的农业的存在”。这揭示了历史上将湖南“洞庭”地区称为“三苗”,本义是对该地区人民发明种谷的肯定。

近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澧县县城附近的城头山发掘出距今 6000 年的古城和稻田。这一重大发现,将我国城市产生的年代提前了 1000 多年,因而引起国际考古学界的震惊。

传说中我国农业的创始人炎帝神农氏葬于湖南酃县(今炎陵县)。《衡湘传闻》记载:神农氏之裔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之耒山”。《明一统志》云“耒水出郴州耒山”,故耒山、耒水和处于耒水之阳的耒阳县均因神农氏后裔在其地制作耒耜而得名。此外,湖南的嘉禾县,传说是为纪念“炎帝之世,天降嘉种,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此”而得名。这些传说说明,湖南先民可能最早得到神农的教导而使农耕技术在全国处于先进地位。

传说中的舜,姓姚氏,名重华,号有虞氏,是距今 4000 多年前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首领,葬于今宁远九嶷山之南。现在,韶山、南岳、道县等地都留有舜的遗迹。且传说舜的二妃葬洞庭君山,舜弟象的封地在道县,舜子商均亦葬九嶷。当地今有舜帝庙。《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舜帝文化是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转折时期的中华文化,是道德文化之源,其精神灵魂可谓“德为先,重教化”。

三苗时期的湖南教育,尽管还没有学校和文字,但家庭、社会的口耳传授所承继下来的农耕技术、建筑技术都是比较先进的;传授的诗歌音乐与中原相比,则别具一格,充满地方特色,开《楚辞》之先河。

考古发现证明,大约在晚商到周初(公元前 11 世纪左右),中原以“弋”和“鸟”为族徽的几个部族有部分人南迁到以今湖南宁乡黄材一带为中心的湘江中、下游地区。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青铜器冶铸技术,并吸收当地的土著文化,铸造了大批青铜器,给湖南青铜文化带来空前的繁荣。湖南目前已出土晚商和周初青铜器 300 余件,除少部分是中原输入的外,皆本地所造,有的是用中原的技术和造型,吸收湖南土著文化的特点制造的;有的从器形到纹饰都是湖南特有的,其中有些铸造技术甚至超过中原,如众多的以动物为造型的铜器即如此;有的铜器造型气势雄伟、奇特,如重达 222.5 公斤的铜铙乐器,这在中原是没有的。

发祥于湖南的荆蛮人具有悠久的历史。为了民族生存和发展,该民族的首领比较重视自己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其主要表现是荆蛮人注重对祖先和各种自然神的崇拜,祭祀繁多。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就有不少用于祭祀的礼乐器。其中特别是宁乡出土的“人面方鼎”,形象别具一格,耐人寻味。该鼎近方型,四面是同样一个人物的头部像,内壁铭文“大禾”。

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技术含量也高。如:考古专家对商王朝制造的“司母戊方鼎”进行科学金相分析,发现其含铜量为 84.77%;对宁乡出土的象纹大铙的金相分析,铜占 98.22%,锡 0.002%,铅 0.058%,锡、铅含量甚微,应是属于纯铜铸成,纯铜具有柔韧性,能发出乐音,制作打击乐器;对“四羊方尊”、“人面方鼎”和铜斧等礼器、兵器的金相分析,发现都含有较多的锡和铅的成分,锡铅能增加器具的硬度和光泽度。由于青铜器的制作要经过选矿、熔炼、制模、浇铸等环节,工艺复杂,技术要求较高,要求制作人员必须具有力学、化学、物理学、冶炼学的专门知识和比较熟练的操作技术,他们必须经过专门而严格的学习和训练,掌握有关部门的知识、经验和各道工序的复杂技术,成为专门人员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因此,青铜器制作的知识、经验和技术就成为商周时代湖南先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传递、学习掌握青铜器制作技术和训练设计、浇铸技能就成为当时教育的主要任务,培养具有青铜器制作的专门知识和熟练浇铸技能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就是当时教育的重要目标。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这些知识技术得以广泛传播并世代传承下去,这就是原始的科技教育活动。

湖南先民给我们留下许多的青铜乐器,如铜铙、铜编铙和铜搏。近年,湖南已发现商代铜铙 11 件,重量一般在 70~80 公斤,最重达 222.5 公斤。湖南发现的“虎纹铜搏”,是一种类似于后来的“钟”的乐器。还有,1993 年,湖南宁乡出土一套商代青铜编铙,共 9 件,通高 36.5~

53.5 厘米,每件都能发出一个或两个不同的乐音,组合可演奏乐曲。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商代最完整的具有演奏作用的青铜编铙。迄今为止,北方中原地区还没有发现铜铙、铜搏等乐器,因此可以肯定铜铙、铜搏是当时湖南人民的创造发明。

湖南发现或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少数的有文字,如宁乡出土的“人面方鼎”内壁有铭文“大禾”,石门出土的“父乙簠”上铭有“父乙”,衡阳发现的“子荷贝”爵上铭有“子荷贝”,邵阳出土的“匚 卣 卣”爵上有铭文,宁乡出土的青铜兽面纹“提梁卣”的盖底有“父罔”、“丕罔”铭文,还有“查戈父鼎”、“皿天全(金)”等。

鬻熊,又称“粥子”,商末周初时期楚人。据史料记载,鬻熊曾担任周文王的国师,因辅佐周文王、武王灭商有功而被封为楚祖。《汉书·艺文志》载有《鬻子》二十篇。颜师古注: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鬻子》一书已佚,有关他“为周师”的事迹,主要见于司马迁《史记》和贾谊《新书》等著作。从书中的有关记载看,鬻子十分重视对君王进行道德、仁爱、和顺等伦理道德教育,这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形成了中国教育的一大特色。鬻子“罢兵”、“非攻”、“无为”、“德论”、“仁政”、“尚贤”、“富民”等思想对后来儒家、墨家、道家的思想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西周早中期以后,湖南铜器的冶铸和制造具有自己的特色,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如湖南出土的西周早期铜铙,西周中期由铙演化而来的铜甬钟,以及铜搏,从造型到纹饰风格多可在湖南出土的商代铜器中找到渊源关系,而在中原西周铜器中均少见或未见。这说明湖南西周的铜器是直接湖南商代铜器进化而来,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芷江县出土的青铜凤形器,造型的巧妙,制作的精致,实为全国所少见,反映出湖南的青铜冶铸和制造技术的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此外,西周时期湖南的制陶业和玉石制造业也有了新的提高。所有这些说明,湖南西周时期的教育水平,比商代还是有提高的。

从远古至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时期,湖南教育都处于原始状态,发展水平十分低下,尚未从生产劳动和生活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分化出来单独进行,没有专门的机构、施教人员和固定的施教场所。教育内容虽非常广泛,但十分简单,凡是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经验、知识、技能、品德、习俗、信仰等都成为教育的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方法主要是口耳相传和行为模仿。教育具有全民性和平等性,即全体社会成员都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接受同样的教育。

自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洛阳至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 548 年,为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湖南逐步并入雄踞江汉平原、与湖南隔江相邻、且同属“蛮荆”群体的楚国,从而使楚人与湘人相互影响、融合,共同开拓湖南,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楚湘文化。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楚墓出土的钢剑,长沙窑岭春秋晚期楚墓出土的铁鼎,证明湖南在 2400 多年前就出现了碳钢,使用铸铁的时间比欧洲早 2100 多年。1951 年长沙识字岭 314 号春秋中晚期楚墓出土的凹字形铁锄,是我国至今发现的最早的铁口锄,也是全世界发现的最早的铁锄。

春秋初期,湖南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已广泛普及,铜矿采炼和铜器铸造业已成楚国的重要

基地,漆木器、竹木器、丝绸和琉璃的生产也相当发达,制作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公元前 519 年,周室王子因与周敬王争夺王位失败,携带王室所藏文物典籍,逃奔楚国,从而使东周文化下移到楚,并同当地的巫文化相结合,产生独具特色的楚国文化教育。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继承西周的教育传统并加以改良,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王室教育和贵族教育制度,庶民的“分业而教”也比较兴盛,并出现了申叔时、屈宜臼、屈固、屈原等杰出的教育家。《管子·大匡》论述春秋各国教育的特点时说:“楚国之教,巧文以利。”战国晚期屈原作《楚辞》,文采绚丽,并讲究功利,既体现了楚国教育的特点,也反映了当时楚国文化教育的较高水平。

据清末学者黄绍箕所著《中国教育史》引用《国语》、《吕氏春秋》、《说苑》、《大戴礼》等古籍论述:“楚庄王方弱,王子燮为傅;及即位,又使士亹傅太子蒍,是楚有傅也。师傅之外,又有保,荆楚文王之保名申。所谓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之教训者,春秋诸国,无不有之。”由此可见,楚国王室设有太师、太傅、太保掌管对王子的教育。其中太师可能还兼有对国王“导之教训”之责。

清末学者黄绍箕在其所著的《中国教育史》中引古文献说:“晋于师傅之外,又有公族大夫,专司教育。《左传》曰:‘荀家、荀会、栾黶、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恭俭孝弟。’疏谓公族大夫,职掌教诲。”以此推之,屈原所任三闾大夫,即掌管屈、昭、景三王族的教育。

春秋诸大国为了稳定社会 and 经济发展,实行分业施教的庶民教育制度。教育目的是为使庶民“不败其业”,“不迁其业”。教育内容以职业技术为主,也包括专业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当时楚国的农业生产、铜铁冶铸和制造、漆木和竹木制造、琉璃制造等均已相当发达,其有关的技术、规程必然纳入教育。史料表明,这种分业而教的庶民业务教育,楚国比较兴盛。如《孟子·滕文公上》载:战国著名农学家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屨、织席以为食”。曾嘲笑过孔子的楚狂人接舆、屈原遇到的渔父和楚国贤人老莱子、北郭先生等可能也是类似许行的人物,一边劳动,一边授徒。

楚国选任官员,重视专业知识和工作实绩,如公孙敖本一介平民,因兴修期思陂等水利表现出色,被楚庄王破格提拔为令尹(即丞相)。其孙蒍掩也是因经济上学有专长,被任命为司马。楚国对掌管各行业的官员,更加要求他们懂得专业技术知识,如《左传·定公六年》记:“王使由于城麋,复命,子西问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辞。城不知高,大小如何?’对曰:‘固辞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这说明担任工尹的人不懂工程建设方面的知识,就必须补课。

从西周时期开始,楚国上下的国家观念越来越明确,甚至将国家摆在国王之上,充满着对自己国家的热爱。楚民族这种爱国思想,必然反映到他们教育之中。楚国教育家申叔时在《申叔时论傅太子》中所强调的“教之春秋”、“教之世”、“教之语”、“教之故志”、“教之训典”,也就是以楚国历史和当时的令训为教,以激发爱国精神。楚国的爱国教育,是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的。